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二

〔日〕森 时彦 / 主编 袁广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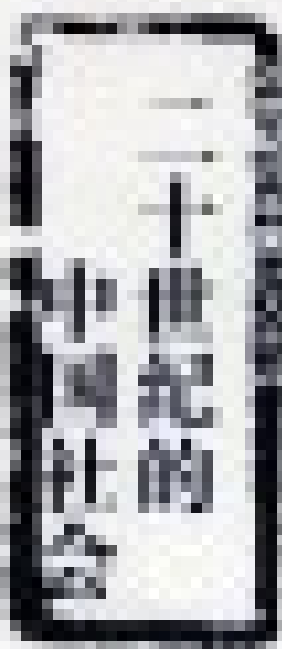
20世紀の中国システム

二十世紀的
中国社会

上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上海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二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上卷)

〔日〕森时彦／主编

袁广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 (日) 森时彦主编; 袁广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2663 - 1

I. ①二… II. ①森… ②袁… III. ①社会分析 - 中国 - 20
世纪 - 文集 IV. ①D66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8925 号

·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主 编 / [日] 森 时彦
译 者 / 袁广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徐碧娜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 ssap. cn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单远举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35.8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598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663 - 1
定 价 / 99.00 元 (上、下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这本《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是2007年4月成立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2007年3月前为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同名课题结题报告。是项研究始于2003年4月，计划用时5年。在此期间，参加成员定期于隔周下午2点至5点举行共同研究会，遇有国外学者来访，则组织临时研究会。5年来，共举行定期和临时研究会凡80多次。现将研究会报告和讨论的部分成果编为本论文集。

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可上溯到1966年开始的“辛亥革命研究”，后来的课题有“五四运动研究”、“民初文化与社会”、“国民革命研究”、“1920年代的中国”等。可见，当时的课题都是选择中国近代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取其前后约10年为期，从多个角度进行集中研究。这种截取时代断面的共同研究持续了约四分之一世纪，至1993年告一段落。其后的研究会分综合与集中两种类型，前者集合不同领域学者就涉及近代史整体的大课题作广泛研究，后者则就某一特定课题作深入挖掘的集中研究。

集中研究由狭间直树教授组织过两个研究组，课题分别是

“梁启超研究——借助日本认识近代西方”（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和“中国共产主义与日本——思想·运动·战争”（1997年4月至2001年3月）。在中断一个时期后，2006年4月重新启动，由石川祯浩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至今。

至于综合研究，原则上按如下设定课题，即不再截取某一时代断面，而代之以大尺度纵向剖析中国近代史；不仅能够通观近代中国社会，而且能够覆盖与近代以前及现代的联系，同时又有助于探讨21世纪中国的走向。按这些条件所作的最初尝试，是1993年4月开始持续5年、于1998年3月结题的“中国近代的城市与农村”研究，继之则是1998年4月持续至2003年3月的“中国近代化的动态构造”研究。幸而，这两个课题都得到关西地区包括年轻学者在内的众多专家热心参加，并于结题后提交了水平较高的论文，从而得以出版了两册研究论文集，即《中国近代城市与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3月）和《中国近代化的动态构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年3月）。

在上述10年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第三阶段综合研究，就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研究。

众所周知，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在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事件而占领北京、清朝被迫签署《辛丑条约》的屈辱中拉开序幕的；而帷幕落下，则是分别于1997年、1999年收回了曾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领土。在这风云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实现了两个预期目标：前50年抵制和抗击了来自欧美列强及日本的侵略，后50年收回了被割让的领土。就这样，从对外关系或政权更替等来看，20世纪的中国可以分作两个时期，而其分界无疑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如果对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作一观察即可发现，以1949年为界将其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而“20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社会在这一百年里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行解读。

该课题吸引了关西地区众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兴趣，研究会正式成员近 50 名。研究会启动时的成员一览表，载于 2004 年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要览《人文科学研究前沿》（『人文科学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人文科学研究所网址：<http://www.zinbun.kyoto-u.ac.jp>），这 5 年间在定期研究会上作研究发表的学者及其题目，请参阅《东方学报》第 76~82 册（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之汇报栏。

该共同研究会还发挥着关西地区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共同研究中心的作用。在这 5 年间，以邀访学者等身份来访并参加研究会、发表演讲或报告的学者有（按来访时间顺序）：王笛（得克萨斯 A&M 大学助教）、孙英（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皮埃尔·埃契艾努·威尔（法兰西学院教授）、颀勒姆·布尔贡（法兰西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建军（西北大学应用社会学部教授）、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马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富三（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灏（香港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玉林（南京大学应用社会学院教授）、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周奕（香港文汇报原副社长）、克劳斯·缪尔翰（芬兰图尔库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熙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金观涛（原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谢寿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杨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玉璞（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为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曲晓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景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陟遥(扬州大学政治系讲师)、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哥特林·缪勒塞尼(海德堡大学教授)、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等等,共计42位。通过他们的讲演和发表,本课题成员得以了解最新研究动向,深受启发,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此外,林满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桑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三位先生,曾分别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半年,对促进本课题的国际研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三位先生从文献解读到资料、数据的检索和收集,都给予我们割切指导,每次出席研究会,都基于渊博学识提出中肯建议。对此再次表示感谢。

最后,还应对分担本书编辑工作的各位表达谢意。研究会成员蒲丰彦、岩井茂树、石川桢浩、袁广泉、森纪子等分别审阅了相近领域论文,小野寺史郎则承担了最终校对工作。假如本书能作为一部可靠论文集对学术界有所裨益,无疑是各位不吝协助的结果。本书出版费用,来自与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从人文学角度分析现代中国的深层构造”项目经费。再次衷心感谢该机构的深深理解并长期资助人文学基础研究。

森 时彦

2009年5月4日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南窗下

序言 森 时彦 / 1

· 上 ·

第一篇 媒体·象征

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

——清末至民国 蒲丰彦 / 3

青岛社会与中国商人的文化作用 高莹莹 / 30

近代中国征婚广告史（1902~1943） 高岛航 / 56

汪伪政府时期的“大东亚战争博览会” 柴田哲雄 / 106

成吉思汗庙的建造 田中刚 / 125

第二篇 社会关系

清末厦门的英籍华人问题 村上卫 / 159

清末山东黄河治水政策史考 细见和弘 / 211

中共党内矛盾与党内民主主义

——蔡和森的尝试及被解除职务留下的启示 江田宪治 / 234

新河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

——以新河县的两名“革命烈士”为中心

..... 石川禎浩 / 272

第三篇 社会制度

外交制度改革与驻外公馆

——以日俄战争后人事制度改革为中心 …… 箱田惠子 / 299

1930年代上海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划定与

征税问题 …… 村田省一 / 328

对自然的拥有形态的多重结构

——“墾埽及涌源”与“单宗耕地”范畴及其

相关权益归属 …… 片山刚 / 348

20世纪中国农村的基层空间 …… 小島泰雄 / 377

· 下 ·

第四篇 文化·教育

明治杂志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 …… 森冈优纪 / 399

清末民初湖南省教育会的职员构成

及其变化 …… 宫原佳昭 / 433

陶行知与杜威访华

——民初中国教育史一瞥 …… 川尻文彦 / 476

韦君宜笔下“历史”的含义 …… 楠原俊代 / 506

第五篇 区域社会

山东开埠与土产交易变迁 …… 森纪子 / 547

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动向

——以广东顺德县为例 …… 宫内肇 / 569

中兴公司的筑路计划及其外交意图

暨台枣铁路经营 …… 袁广泉 / 600

20世纪河北省新河县的社会流动与户口变化动向 …… 森 时彦 / 628

※ 第一篇 ※

媒体·象征

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

——清末至民国

蒲丰彦*

前 言

现代中国的标准语言即“汉语”，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文字则使用简化汉字即简体字。不过，“汉语”现在的形态，是经长期的争论和实践逐渐演变而来，其中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国语统一论战、1930年代的大众语论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语言政策等。另外，清末以后，新教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也曾关注中国的语言问题，并就旨在取代汉字的书写方案进行了探索。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中国信徒，但其视野却并非仅囿于传教，还涉及中国社会与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识字、教育、标准语、社会近代化等问题，其中不少观点后来也为中国人所认同。

此前，有关清末在华西方人士就文字改革所作的努力，尚未有人进行梳理，而以此探索中国人自己后来是如何进行语言改革

* 京都橘大学文学部教授

的，也未见充分研究。村田雄二郎在论述国语统一论战的重要性时曾说，“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语言改革中所争论的问题，其实与五四国语统一论战基本相同”。^①实际上，国语统一论战的起点可以上溯到在华西方人士清末以后对文字改革所作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又受到了1830年代英国殖民地印度兴起的罗马字论战的影响。

关于在华西方人士提出的各种书写方案的语言学特征及其在闽南语范畴内的相互继承关系，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但是，据笔者所知，以在华西方人士就中国语言所作的全部探索为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的，目前仅有弗兰西斯（John De Francis）。^②弗兰西斯在对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金尼阁（Trigault Nicolas, 1577 ~ 1628）、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等人的努力进行梳理后明确指出，旨在用罗马字符替代汉字的尝试，是185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首先开始的，不久后，语言改革又被视为社会变革的一环；传教士却不愿看到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因提倡语言改革而被改变，但这时中国人也开始关注文字改革，传教士于是退出了正面舞台，将提倡文字改革的使命交给了中国人来完成。

但是，弗兰西斯探讨的仅是当时有关论争的一小部分。而本文则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即首先回顾马礼逊时期至清末的各种观点，同时对采用罗马字符设想的出现、拼写规则的改良、口语的提倡、统一拼写方案的制定等一系列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探讨这些尝试在进入民国时期后何以突然销声匿迹。

① 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战——从“白话”到“国语”（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白話」から「国語」へ）》，《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転換期における中国の知識人）》，汲古书院，1999，第7页。

② John De Francis, “A Missionary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3 (1948);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不涉及天主教。天主教传教士不太关心文字改革，没有值得关注的动向。^① 本文利用的资料，主要是按时间顺序探讨 19 世纪在华西方人士活动的基本资料——《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 ~ 1851）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1867 ~ 1941），同时参照当时出版的各种辞书和传教士的著作。

1. 五口开埠以前

1. 早期传教士

据认为，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他翻译圣经采用的是倾向于口语的文体，可见其传教对象是仅受过浅显教育的普通民众；但并未抛弃汉字。他对用罗马字符书写汉语口语抱怀疑态度，曾说：“试图不用汉字而传达中国口语，并非不可能，但十分困难，大多情况下，只会给学习者造成困扰”；^② 不过，他坚持使用汉字还有更为积极的理由。他当时正设想创建恒河外方传道会（*Ultra Ganges Mission*），而“中国书面语言”有助于该会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传教。^③

弗兰西斯虽然未出示根据，但曾明确指出，直到 1834 年马礼逊逝世，语言学家和一般人士几乎一致认为，书写汉语离不开汉字。^④ 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的立场，除了汉字自古以来就是汉语的书写文字，且在中国以外也被广泛应用这一事实外，也与早期传教

①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1950，第 23 ~ 29 页。

② *Literary notices*; 1, *Chinese Repository* 3 (8) (1834): 386. “To convey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out the character is not impracticable, though it is difficult and often embarrassing to the learner.”

③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in the native character, with translations and philological remark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5): 3.

④ John 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18.

士往往过高估计中国人的识字率有关。被称为马礼逊传教事业继承人的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 ~ 1857) 就曾说过, “中国识字人数之众, 令人吃惊。半数男子能够阅读……”;^① 美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 和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 ~ 1846) 也称中国人“爱好书籍”, 是“读书的人”。^② 当然, 这种观察在五口开埠后发生了变化。

2. 提倡采用罗马字符

1834年8月, 汉语权威马礼逊去世。不久, 同年1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第3卷第8期刊载了一篇文章, 其中论及用罗马字符书写汉语是否可能。这是一篇未署名书评, 评介对象是一部有关当时出现在印度的、主张采用罗马字符进行书写的资料集, 名为《加尔各答东方语言罗马字符化资料选编》。^③ 作者认为, 印度的罗马字符化, 其影响可能波及缅甸语、暹罗语、爪哇语甚至日语; 最后在谈到上述马礼逊对用罗马字符书写汉语的怀疑态度时, 作者不无玄虚地说, “这种看法之正确毋庸置疑, 但是, 如果数年后有人说, 中国文字被罗马字符取代了, 恐怕不会令人吃惊”。^④ 翌年, 即1835年5月, 该杂志第4卷第1期再次介绍罗马字符化在印度成果可期。就这样, 至少从《中国丛报》看, 中国有人谈论汉字

①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J. Snow, 1838), 144.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acquainted with letters in China, is amazing great. One half of the male population are able to read; . . .”

②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nson D. F. Randolph, 1864), 59. “[T] he Chinese are a bookish people.”
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J. Abeel Williamson, 1836), 146.
“ [T] he Chinese are a reading people, ”

③ *Select papers on the subject of express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East in the English character, extracted from the periodicals published at Calcutta, in..* (Serampore Press, 1834).

④ Literary notices; 1, *Chinese Repository* 3 (8) (1834): 386.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se opinions we have not the shadow of a doubt; nor should we be surprised, were it to be announce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that ‘the written character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is giving place to the Roman.’ ”

罗马字符化，是从关注印度的动向开始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印度的状况作一介绍。^① 1830年代中期，此前出于好奇、憧憬而对印度取尊重态度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开始认为印度文明野蛮、不开化，并试图以西方文明对其加以改造；在教育行政方面，就是否应该引进英语而发生了英语教育论战。1834年1月，殖民地行政官德勒韦恩（Charles Edward Trevelyan, 1807~1886）提出印度当地土语应该采用罗马字符书写，开印度文字罗马字符化主张之滥觞。对此，主要是印度文明拥护者表示反对，论战一直持续到1837年。上述刊登于《中国丛报》的书评所评介的，就是1834年刚刚出版的有关这场论战的资料集。

德勒韦恩将大众教育视为其作为殖民地行政官的首要职责，并按这个观点提倡罗马字符化。他说，罗马字符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而采用罗马字符则有如下好处：（a）易于阅读，（b）印刷经济、迅速，（c）无须再学习城体字母及波斯、阿拉伯等多种文字，（d）有助于国民文学的成长，（e）可促进英印两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其中，（d）和（e）需要补充说明。德勒韦恩认为，印度的大众语言尚未成熟，若采用罗马字符书写，有利于引进英语中的优秀语汇和概念；而此种语言同化（assimilation）将会增进英印两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印度的大众语言也将逐步成熟，将来足以承载崭新的国民文学。其他主张采用罗马字符的人则进一步认为，使用相同文字，有助于加强国民意识等方面的认同感。

除文字的罗马字符化外，这场论战还涉及拼写方案的问题。当时，印度有两套罗马字符拼写方案。其中之一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提出的。鉴于因罗马字符拼写没有一定的标准规范，亚洲的历史学、地理学又异常混乱，琼斯于1788年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元音和辅音分别仿意大利和英语进行

① 以下记述请参见拙稿《19世纪印度罗马字符化论战（19世紀インドのローマ字論争）》，《东洋学报》88（4），2007。